

多重话语的表达与纠结 ——王蒙小说《这边风景》的话语考察*

罗宗宇, 黄珊

(湖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 小说《这边风景》存在着政治话语、日常生活话语和“小说人语”三种不同的话语。政治话语表达政治意识形态的声音,在文本中居中心支配地位。日常生活话语表达日常生活内容,总体上是对政治的疏离,但也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在小说中居于次要地位。“小说人语”是作者在《这边风景》正式出版前于每章末尾所加入的一种回顾性反思话语,它实现了对政治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的反思和超越。多重话语的表达与纠结,表明了《这边风景》创作的复杂性。

[关键词] 《这边风景》;政治话语;日常生活话语;小说人语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7)03—0116—05

The Expression and Entanglement of Multiple Discourses ——Discourse Analysis of Wang Meng's Novel *The Scenery Here*

LUO Zong-yu, Huang Sh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discourses in Wang Meng's novel *The Scenery Here*: political discourse, daily life discourse and the author's word. Political discourse expresses the voice of the political ideology, which is the dominance center of the novel. Daily life discourse plays the second fiddle of the novel, showing an alienated attitude and constrained by main ideological in many cases. The author's word was added at the end of each chapter before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 It completed the refl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daily life discourse

Keywords: *The Scenery Here*; Political discourse; Daily life discourse; the author's word

一个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往往对作家的话语表达具有重要的影响,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讲述话语的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总是会在不同程度上对话语主体进行规训,规约话语的内容和形式。王蒙的小说《这边风景》正文部分创作于1974至1978年间,与讲述话语的年代相关,《这边风景》中有较多体现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与此同时,也有表现民间风俗、人性情感和诗性自然等日常生活内容

的日常生活话语。在2012年正式出版前,作者又于每一章最末处加入“小说人语”,“小说人语”是王蒙对自己四十年前小说创作的回顾和反思,属于回顾性反思话语。《这边风景》的话语表达由此具有多样性,三重话语在小说中呈现出纠结状态,其中政治话语处于中心支配地位,但日常生活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构成消解。“小说人语”因写作时间的后置,实现了对政治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的反思和超越。

* [收稿日期] 2016-1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研究》(14BZW159)

[作者简介] 罗宗宇(1968—),男,湖南湘潭人,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 多重话语的表达

尘封多年的《这边风景》面世后,最受评论家诟病的一点就是小说正文中多处存在的政治话语^①。《这边风景》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情节冲突设置、叙述者语言等方面都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小说的正面人物伊力哈穆、米琪儿婉、艾拜杜拉等,都出身贫农,坚持阶级斗争和维护民族团结。而反面人物则无一例外存在“阶级政治问题”,如小说中汉族社员包廷贵恶意煽动民族矛盾的言行,是因为他是一个“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坏分子”“一个有案底的外来“盲流”。玛丽汗和依卜拉欣两个地主分子总是躲在暗处散布民族分裂的谣言。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也常常是“文革”时代话语,如“各种分子多了去啦,都是坏蛋,都是敌人,对他们要狠狠地斗,斗倒了他们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1](P257)}“不联系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不斗倒阶级敌人,就没有好日子”^{[1](312)}等等。小说情节冲突也设置为阶级冲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几个核心情节如边民外逃、死猪事件、生产队粮食失窃案等莫不被归为阶级斗争。小说中还多次出现了叙述者暂停叙事,进行有政治色彩的评论发声。如小说第二章主人公伊力哈穆在重逢老干部热依穆时,突然插入一段评论:“在我们国家的广大农村里,有无数个这样的最基层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经常为集体而操劳,没日没夜、无暑无寒,而他们对生活从来没有过分的奢求,更没想过给自己捞一把……正是他们,构成了我们党的各项事业的支柱,构成了社会主义农村的基石。”^{[1](P19)}又如在小说第三十七章,叙述者用充满激情色彩的语言评价学习“毛选”的行为:“这是最严肃、最激动、最幸福的事情,是解放以后数亿中国人每天都要认真做的一件大事,是旧中国和国外从来没有的一件规模最大的盛举,这个盛举的名称就叫做‘学习’。”^{[1](P471)}

在《这边风景》因政治话语受到批评之时,一些研究者也发现了其中的日常生活话语并大加赞赏^②。小说中的日常生活话语表达日常生活内容,

既有对新疆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展示,也包括对老百姓日常情感与劳动生活的表现,还有对新疆自然风光的描绘。王蒙多以现场感极强的笔触将新疆少数民族的民俗生活场景进行展示,如吃抓饭,“五个人跪在盘子旁边,用右手的四个手指撮成一个勺形一舀,在盘边上拍一拍,使它结实一点以免掉饭粒,再用大指捏上一捏,最后在大指的帮助下送到嘴边一抹,最后再一次把手指上的饭粒和余油吮吸干净。”^{[1](P334)}又如王蒙向读者介绍维吾尔族的毡上生活:“维吾尔族人的生活方式是室内除了炉灶和灶前烧火的一点地方以外全铺上席子,席子上铺上毡子(有钱人就是地毯了),一切活动包括吃饭,睡觉,谈话都在毡子上进行,毡子起着桌椅板凳和床铺的作用。”^{[1](P475)}小说还多次叙写劳动场景,如写打钐镰:“随着镰弓带风的嗡嗡作响,‘沙’地一声,划过了一道两米多长的弧线,一大片苜蓿被齐齐地割了下来,并在镰弓的带动下茎是茎,梢是梢地排列在一堆……”^{[1](P100)}又如写扬场:“扬场像一种享受……‘嚓’地一响,满满的一堆麦子被抛起来了,洒开,像一道金龙一样从木锨头上伸展开,然后像一个狭长的扇面形彗星一样在空中略一停留、亮相,最后像雨点一样‘刷’地落到了地上。”^{[1](P255)}

爱情也是《这边风景》中日常生活话语所表现的内容,如写廖尼卡爱上了跳上他自行车的姑娘,他在院子里种满了鲜艳的红玫瑰,并一夜又一夜地为姑娘拉手风琴。写美丽而又不幸的莱希曼为了心上人勇敢抗婚,被打四十鞭仍不屈服,衣衫褴褛地逃跑出来,唱着令人肝肠寸断的歌曲,至死都在等心上人。写朴实英俊的艾拜杜拉给雪林姑丽原本灰暗的生活带来了光明,让雪林姑丽“第一次发现生活是怎样可以愉悦人的心灵。”^{[1](P206)}此外还有真正的“维族男子汉”泰外库在遇到心上人爱弥拉克孜时,竟然手足无措,如“猛虎轻嗅蔷薇”般的笨拙,都写出了少数民族的浪漫爱情追求。

对自然风光的诗性描绘也是《这边风景》中日常生活话语的重要表达。郁郁葱葱的云杉密林,硕果累累的葡萄架、一望无际的草原、壮丽的雪山等

① 如施津菊批评这部作品“不仅在主题意蕴上毫无新意,语言表达上带有‘政治’化的文学腔和‘文革’式的类似于‘表忠心’的陈词滥调也随处可见。”(施津菊,王蒙旧作新发的意义质疑[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4,(1):29.)余开伟认为“王蒙先生为紧跟当时形势,配合当时的政治宣传,适应当时政治需要,以伊犁塔城边民外逃事件和农村四清‘运动’为背景,创作了《这边风景》这部长篇小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生败笔,文学败笔。”(余开伟,畸形的王蒙《这边风景》[J].扬子江评论,2013,(4):77.)

② 如陈晓明评价《这边风景》“是中国当代少有的反映了多民族生活的作品”,“这部作品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文化协奏曲,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真实记录。”(陈晓明,《这边风景》:历史与文学的时代证词[N].文艺报,2015-9-28(3).)温奉桥和李萌羽认为《这边风景》“对伊犁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诗意描写和对生活细节的精微刻画,展示了作者超强的写实功力,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历史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历史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并赋予了这部创作于‘文革’期间的小说某种超越性审美品格。”(温奉桥,李萌羽,噤声时代的文学记忆:王蒙新作《这边风景》略论[J].小说评论,2013,(3):89.)

等,都是小说多次描绘的对象。如对秋冬伊犁农田充满诗意的描绘,丝毫不见常见的萧索凋敝:

地里庄稼不见了,青纱帐已经卷起,田地脱下了覆盖终年的由绿变黄的羽衣,敞开它那巨大无边的胸膛,拥抱着这深秋的,或者更正确一点应该说是初冬的太阳。人们的视线可以不受阻碍地看到远方的地平线,看到雪山的越来越大的银冠,看到伊犁河对岸察布查尔的牧羊人点燃的堆堆篝火,团团烟气升腾在晴朗透明的天空中,消散无迹。^{[1](P347)}

除正文部分的政治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外,在《这边风景》的每章末尾还有“小说人语”,它是小说正式出版前王蒙在每章后面加入的独立于正文的文字,类似于《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和《史记》的“太史公曰”。简明扼要的“小说人语”有时是为了抒发若干年后重读旧作的感慨,如小说第五十一章末尾的“小说人语”表达王蒙重读时的感受:“这一段……什么时候重读什么时候会把小说人自己激动得热泪盈眶、泪流如注,读一次大哭一次。因为爱。因为尊严。因为痛心疾首!”^{[1](P636)}更多的“小说人语”则是一些对当时人、事和写作的评论,小说共有“小说人语”57节,其中带有评论性质的“小说人语”约一半左右。如评价爱弥拉克孜“她是那样美丽又不幸,尊严而又遗憾,骄傲而又艰难,温雅而又端庄,自信而无言……她是小说人码字儿树立的一座石雕。”^{[1](P499)}如第五章末尾的“小说人语”评论写作:“政治的宣扬难免没有明日黄花的惋惜,生活的实感则用它的活泼泼的生命挽救了一部尘封四十年的小说。理论主张、条条框框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生活万岁!”^{[1](P52)}

二 多重话语的纠缠

《这边风景》中的多重话语表达呈现出一种纠结关系。正文中多处存在的政治话语处于支配地位,日常生活话语作为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本中受到政治话语的规约,它首先表现在小说中人情和情爱叙事的节制。小说将男女情爱写得很节制,有时甚至会出现叙事情节的断裂。例如小说把雪林姑丽的春心萌动写得很美、很纯,有铺垫,有渲染,篇幅也比较长。但是在第十八章详细描绘雪林姑丽的夏夜“单相思”之后,这条爱情的线索就基本断裂了,直到第二十九章才重新接上,但从“单相思”直接“快进”到了新婚旖旎的场面,谈情说爱的

过程就此缺失。这种情爱叙事的断裂在小说中并不是出现一次,小说中有关泰外库的情爱叙事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叙述者开始反复渲染泰外库对独手女医生爱弥拉克孜求而不得的“单相思”,对二人的相识和误会的产生、解除也写得很生动。但当二人的误会解除后,小说叙事却再也不见二人的任何情感互动,直到最后一章才简单交代了二人的结局:“经过了爱和恨,冷和热,欺骗和真诚,疯狂和清醒,他总算学到了一点东西。现在,当他和妻子爱弥拉克孜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总是用‘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些年’这些字眼,好像是在说遥远的往事,甚至好像在说另一个泰外库。”^{[1](P698)}

政治话语对日常生活话语的规约还体现在常常将日常生活话语强行拔高,如第十八章“夏收时节的谐谑曲与小夜曲”部分,狄丽娜尔和雪林姑丽这两个闺中密友的谈话本来有“小夜曲”式的宁静美好气氛。然而却在狄丽娜尔谈论自己的苦闷时突然插入了几个不和谐的音符:

(狄丽娜尔:)
“……爱国卫生运动是年年都要搞的,每几年还要大搞一下,才能把除四害的成绩巩固起来。人也要这样,我们早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知道,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公道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的思想呢?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库瓦汗吧,或者不看别人,就看看自己,看看我爸爸、廖尼卡和我自己吧……也许,我最大的错误,就是过早地结了婚……”^{[1](P209)}

在此,政治话语侵入原本属于“闺蜜私话”的日常生活话语空间,借人物之口进行政治宣传。如果脱离文本设定的具体环境,仅仅从笔者标注的这几个句子来看,很难看出这是一个年轻少妇与好友间的“悄悄话”。又如小说第二十九章写雪林姑丽和艾拜杜拉的新婚,新婚夫妻不谈“儿女情”,反而谈大寨,谈劳动建设,“艾拜杜拉起劲地讲着大寨的事情。他那样热烈、真诚、匆忙地讲着,眼睛里闪耀着火花。”“大寨的光辉,照亮了伊犁的维吾尔族农民的心,也照亮了他们的前程。艾拜杜拉的话语里,展开了一个巨大的天地,比他们的小房子开阔得多,宏伟得多,也坚实得多。”^{[1](P378)}更有甚者,当雪林姑丽和艾拜杜拉在新婚之夜刚刚开始属于恋人之间的互动时,公社技术员杨辉就闯进来大谈公社的技术建设,并建议雪林姑丽离开新婚丈夫和家庭,到公社的技术实验站参加学习。杨辉在新婚夜的突然出现,完成了政治话语对日常生活话语空间

的入侵,于是新婚夫妻俩决定在结婚第二天就投入社会主义的建设,雪林姑丽去公社技术实验站学习农业科学技术,艾拜杜拉去报名参加伊宁市的陶厕所工作。

如果说政治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是文本创作中的一种共时性纠结的话,那么“小说人语”则属于文本创作中的一种历时性存在。时间的后置使王蒙能站在“21 世纪的态度和立场”对政治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进行回顾和审视,实现思想的超越。在“小说人语”中,王蒙承认自己在创作时“拼命靠拢‘文革’思维以求‘政治正确’”,“这篇小说里,多有应时应景的却也是事出有因的政治宣扬”^{[1](P52)},认为小说正文中的确存在带有“文革”色彩的政治话语,“这篇小说很注意它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下的‘政治正确’性,它注意歌颂毛主席与宣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它注意符合在‘文革’中被吹上天的‘文艺新纪元’种种律条。”^{[1](P543)}当然,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者,历史对于王蒙也许并不是一段苍白的否定性文字,而是一段鲜活的生命体验,与他的青春岁月血肉相连。因此,王蒙对这些政治话语的反思比较温和,他在访谈中曾说:“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尤其是写‘小说人语’的时候,是对那个时代有批判、有怀念的……这种怀念虽然不意味着我对当时政策的认同,但是,当时总体的政策很难一下子全否定,因为它是一个摸索的过程”^[5],他在反思小说中“应时应景”的政治话语时,或多或少加入了感性的因素,“小说人语”中这种感性的成分损害了反思的深度,展现出老年王蒙对待历史的复杂心态,“我们仍然希望能保持而不是全然丢弃我们当年的认真的梦……只因为我们傻过,我们信过,我们真诚,我们爱过。”^{[1](P701)}值得注意的是,王蒙对民族团结的政治话语始终予以肯定,如第十一章“小说人语”:“是的,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民族团结,否则,就是罪过!”^{[1](P118)}

“小说人语”对于日常生活话语给予了肯定,如针对小说第十六章写农民在政治流言和阶级斗争中的两个生活场景,一是冬天围绕在火炉旁有说有笑地给玉米脱粒,二是秋后迎接大丰收,收麦子,做拉面条。“小说人语”这样说:

许多伟人伟思伟力想改变生活,确实也改变了生活。同时生活在改变着伟人伟思伟力,使伟人伟思伟力生活化与世俗化。当你努力把平常日子变为惊天动地的英雄大戏以后,惊天动地的大戏也就变成平淡如常的朝朝暮暮了……^{[1](P186)}

显然,“小说人语”肯定了日常生活话语对于政治的消解作用,在此提醒读者从更深层意义上来体会自己当年的表达,表明王蒙在革命激情后的理性。

在新的生活背景下,“小说人语”还注意进一步提升民俗和自然风景书写所具有的文化乡愁意义。当年伊犁农村打钐镰、扬场的场面,在农业日益机械化的发展中随时代远去,“到了崭新的世纪,农业的机械化的迅猛发展,使得这威武雄强的钐镰也成为稀罕物了。”“小说人语”提醒人们,“人们会忘记钐镰与坎土曼吗?像忘记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反修防修……”^{[1](P103)}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当年作品中的这一叙述“毕竟留下了神秘的、异域风情的不同画面。”^{[1](P133)}田园牧歌式的劳动生活如同王蒙记忆中“装在许多小陶罐里的熟奶”,这样的风景当然已经消失,但是小说中的相关内容却留下了“最后的纪念。”^{[1](P657)}

三 政治规约与自我选择

如前所述,《这边风景》中多重话语的表达与纠结使小说具有一种复调性质,相对于“‘少共’王蒙”的单纯,《这边风景》展现了一个复杂化的王蒙,它是王蒙小说创作里较为独特的现象,其原因何在呢?《这边风景》创作于“文革”中,文本中政治话语占主导无疑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整体上得到延续和加强,到“文革”时期走向极端,偏离“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作品都会受到批判。对此,王蒙早就有切身体会,1958 年被划为“右派”,1963 年远赴新疆,王蒙清楚地认识到“生活已经被口号和运动取代,没有口号和运动的人已经失去了生活的权利,不带上口号的帽子的生活将无权被描写。”^{[1](P359)}因此在创作《这边风景》时,王蒙在政治意识形态规训下主动自觉选择一种政治话语占主导的创作立场,以确保小说创作的政治正确与合法性实属必然。

而《这边风景》中存在大量的日常生活话语则首先与王蒙在现实困厄中以创作进行心理宣泄和补偿有关。1974 年开始动笔写《这边风景》时,王蒙长期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空虚中,“他好像被彻底抛进边疆‘挂’了起来,既无人问津,又不通任何消息。”^{[2](P96)}而“当个体在一定的历史中反复咀嚼和承受生存的威胁和冲突时,必然向历史、人性的深邃之处,努力发掘黑暗洞穴中的人性之光,寻求

人性自由的诸多可能。^{[3](P31)}现实的困厄使得王蒙在小说中有意构建一个温暖、人性、多彩的日常生活空间,他在接受访谈时的一段话透露了这种心理:

《这边风景》真实地表达了我个人处在逆境、国家处在乱局的现实。然而,虽然是在逆境和在乱局之中,但它仍然表达了我对人生的肯定,我对新中国的肯定,我对少数民族人民、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农民的肯定……我有光明的底色,即使在逆境和乱局之中我仍然充满阳光,仍然要求自己充满阳光,我仍然有一种对边疆、对土地、对日常生活的爱。^[4]

《这边风景》中写春种秋收、养牛放羊、刷房子、做牛杂碎、宴请好友,正是王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采取颇为迂回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精神避风港,以此宣泄内心的焦虑、苦闷和追求。

除心理宣泄和补偿外,小说中大量日常生活话语的表达,也表明王蒙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时有一定程度的警觉与疏离。王蒙妻子曾在回忆中谈到王蒙当时的创作状态:“谁也不曾料想到,他在写作中遇到了巨大的难以克服的困难。当时‘四人帮’正在肆虐,‘三突出’原则统治整个文艺界。王蒙深受二十年‘改造’加上‘文革’十年‘教育’,提起笔来也是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在生活中,他必须‘夹起尾巴’,诚惶诚恐,而在创作中又必须张牙舞爪,英勇豪迈。他自己说,凡写到‘英雄人物’,他就必得提神运气,握拳瞪目,装傻充愣。”^{[5](P34-35)}如果王蒙全身心地顺从当时的主流政治规范,断然不会产生“战战兢兢”的感觉,王蒙之所以“战战兢兢”,是因为他骨子里仍旧不肯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他曾说“文学也是不可摧毁的,虽然在创作中不得不考虑当时的政治背景,甚至作品里也搬进了一些政治口号,但是当你进入细节的时候会发现,其中的人的动作、表情、谈吐,都是文学层面的。”^[5]《这边风景》中写民俗生活和边疆风景等,正是王蒙努力在主流政治话语的缝隙中寻找一种文学性表达的可能。前面所述王蒙在处理人物情爱叙事时的叙事断裂或者说是“壮士断腕”,既避免了政治对情感生活的进一步图解和规约,又在艰难的文学环境下坚守了艺术底线,保全了自我。当然,这种政治话语的疏离并不是挑战,而是煞费苦心的短暂游弋,如王蒙所说:“我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时候开始写这部作品,当时并没

有足够的认识和勇气来挑战‘文革’,我并不是把它作为一部反叛、‘点火’的书来写的。”^[5]“在这个左了又左、荒谬得不能再荒谬的时代中,我抓住了一个机遇,就是毛主席用‘二十三条’来批评此前在社教运动中的‘形左实右’。我于是找到了一个可以合法地批评极左、控诉极左的机会。这已经算是挖空心思了,否则我只能歌颂极左,那既是生活的逻辑不允许的,也是我的真情实感不允许的。”^[5]

如果说小说中政治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的纠结源于特定时代王蒙在政治规约和精神自我之间的选择的话,那么“小说人语”的出现则是王蒙出于对《这边风景》文学史面貌和价值的考虑。王蒙在创作谈中曾说:“这本书出来,对于读者来说是新作,对我来说却是旧作,我不想对这部旧作做过多的改动,第一我没有这个能力,第二就会使那个时代的很多时代特色都消失了。”^[5]王蒙在作品修改中基本没有淡化小说中的政治话语,是因为这些政治话语已经在文本中成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和历史性镜像。如果从现在的立场观点出发对其进行修改,肯定会损害文本的文学史面貌和“知识考古学”价值。而作为一个多思的作家,王蒙又有表达作为“过来人”的反思需要,“需要有一个21世纪的态度和立场,需要给读者一个交代。”^[5]因此就有了“小说人语”,通过“小说人语”,在保留旧作原貌的情况下,王蒙一方面可直接评价反思自己当时的创作,展现自己思想立场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可引导读者注意作品中不容易被发现的深层意蕴,同时还增加了《这边风景》的话语表达途径和张力。因此,《这边风景》的多重话语表达和纠结,是特定时代政治和作家个体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亦是王蒙小说创作复杂性的一个证明。

[参 考 文 献]

- [1] 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 [2] 方蕤.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 [3] 江腊生.新时期文学的焦虑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4] 刘颀,行超.王蒙:《这边风景》就是我的“中段”[N].文艺报,2013-05-17(002).
- [5] 曹玉茹.王蒙年谱[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